

## 就用常识的方式，开创千年未有之非暴力变革新局面

作者：杨百尼

### 前言：从一个两代人困惑多年的问题说起

八九六四民主运动过去三十四年了，天安门广场大屠杀时，我还只是个到省城求学的懵懂农村少年，对政治的认识大体停留在教科书及官方的宣传层次上，但那时我对于这个国家的城乡差距、社会不公、不平等，我就已经有了切身的体会。步入社会后，由于外贸工作需要提升英语能力，我经常收听 VOA、BBC 等国外电台节目，透过无线电波，使我了解到自由民主国家对中国社会的真实报道以及对中国政治问题的看法，从此，无意中开启了我的自由民主思想，使我逐渐形成独立思考分析判断的习惯。香港主权移交前我经常去那里出差，对自由社会与自由经济的体验，使我对自由的珍贵有了切身的体会，让我对中共政权的洗脑愚民产生越来越强的免疫力，直到如今，再也没有回过头。

我父亲是个退休教师，湖南许多老人对于美国日本台湾问题如数家珍，有点像早年北京的哥对南海的那些事张口道来的意思，谈论起国民党民进党就像说自己县城里的麻将馆一样。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期间，尤其是智能手机普及后，老人家对外界的信息越来越关注。前几年，每次我回老家，他总是对我说一个让他特别困惑的事：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中国有那么多当官的有钱的有知识的人去过欧美那么多发达国家，有那么多厉害的学者专家教授还有世界级的企业家，明明知道中国的政治制度有很大的问

题，可为什么几十年了政治方面还是没有丝毫进步？作为一个在民营企业工作了多年的人，我父亲困惑的问题，也曾经是我反复思考的问题，并且，多年来我一直关注海外的民主运动，也参加过国内的一些公民行动，二十多年前还发起创立过社会公益平台。在多年的社会实践和观察思考之余，我也常常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八九六四民主运动过去三十四年了，互联网的普及并没有带来民智的广泛开启，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产阶级的崛起也并没有带来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中共政权在经历各种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危机，包括民主运动及公民维权对其合法性的严重挑战后，中共的统治不仅没有任何的松动，反而越来越巩固，对这个国家社会与人民的控制越来越严密，几乎达到了滴水不漏、铁板一块的极限程度。

六四民主运动至今年 7 月三十四年来，我一直在中国生活，在国内亲自见证了一系列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冲击。例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邓小平南巡，香港主权移交，江核心推出三个代表，台湾政权第一次和平轮替，历次台海危机，中国加入 WTO，911 恐袭，北京奥运，零八宪章，金融危机，胡温搞和谐社会，习近平登顶，中美贸易战，香港反送中，习修宪，新冠疫情三年的动态清零管控，俄乌战争，中共二十大定习于一尊等等。过去三十四年，我亲自感受了各种重大的国际国内政治事件对中国社会思潮及民间心态的影响，以及中国民众的思想观念的变迁。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观察和思考，对于上述问题，我早已有了比较清楚的答案。因此，对于未来中国非暴力变革的思路、方向和方法，多年前我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受托马斯·潘恩的《常识》的启发，早在 2009 年我就打算写一本《国家的误会》的小册子。今年我已经完成了该小册子的大部分内容，本文正好是该小册子的一部份。

思路决定出路，格局决定结局，认知决定方法。正如寻医问诊，只有透过表象切中了背后的真正病根与病因，才能拿出标本兼治、长期有效的药方，非暴力社会运动或变革的思路与方案亦是如

此。

正如“中国行动”官网开宗明义阐明其目的：“在于终结中国数千年之专制制度，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文明的、真正的新中国。”诸多海外华人政治团体派别无论背景、理念及主张如何，自由民主宪政的新中国乃是无可争议的一个共同目标。然而，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手段、策略却千差万别、各不相同，甚至有的完全对立，这归根结底是由于不同的团体派别在认识论方面存在重大差别，由此产生方法论的迥异或对立。无论如何，毋庸讳言，有一点是基本肯定的，过去三十多年来的一切民运及公民运动的结果表明一个基本事实：在怎样实现中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文明国家的方式及手段方面，迄今为止还没有真正对路对头的途径和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个局面就有点像一对大学教授夫妻，结婚后该做的也看似做了许多，但多年来就是没有怀孕，一直没有爱情的结晶，最后这对高知夫妻去看医生，结果才知道男教授根本没找对地方，压根就没找到门路。这不是什么段子，而是血淋淋的现实。

这听起来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甚至很荒谬，因为这太违反本能和常识了，但中国许多事情就是很荒谬，就是那么邪门，许多人、事物、现象就是违反常理常情和常识，某些政治历史学识与认知水平还不如一个微信公众号号主人，竟然可以位居政治局常委，所谓党国领导人，而许多本应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才干的仁人志士们，不是在监狱就是在去监狱的路上。毫无疑问，过去三十多年之所以造成中国种种现状，一定是没做对什么，必定是还没摸到门路。

本文就是要解决思路与方法对头、对路的问题，在此之前，需要对中国的国情做一些基本的分析。

本文不是论述形而上的道，而是尝试分析形而下的法与术，但论到过去百年中国知识分子跟中国命运的关系，以及即将到来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就不能不谈知识分子，就不

能不谈知识分子的认知问题，既然谈认知，就离不开道。道的终极追问，指向终极真理与人性、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但暂且点到为止，本文文末会有一个简要的分享。

一个无比骨感的现实结论：

在我成人后，尤其是价值观基本定型后，过去近三十年在中国生活、持续实践、仔细观察并深入思考所发现的，当下中国具有自由民主宪政理念的人，其实少得可怜，就算有那么极少数，他们对中国现实社会的实际影响，实在是微乎其微。中共政权权贵阶层精致的利己主义，他们的基本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及新左派，以及为这个体制的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撑的新权威主义，再加上小众的儒家及新儒家，这些群体加起来才构成了中国现实社会的绝大多数。如果有人得出跟这完全不同或相反的结论，那更可能是一种视觉心理或认知理解上的“幸存者偏差”，因为身处海外自由国家，无论在互联网虚拟空间上的推特，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其最密切接触或相关的，自然与中国现实社会的主流成份截然相反。

综上所述，目前而言，中国任何一个单独的群体，都不足以主导未来可持续的非暴力变革，过去三十多年的历史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最理想也最可行的是，具有良知与正义感，且愿意以实际行动追求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宪政的以下几个群体的联合：维权律师，知识分子，媒体人，觉醒的民营企业家/企业家。一盘散沙、群龙无首，这是中共政权最乐于见到的局面。那么，究竟谁来推动、领导接下来的非暴力变革呢？这是本文后面也会涉及到的问题，本人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民营企业家企业主一点都不傻，自由民主宪政其实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如何转化一切可转化的民间力量？怎样用“草船借箭”的方式，把中共政权的基本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左派变成自由民主阵营的势能？如何创造一个非暴力变革的历史风口，并顺势而为？这些都是今后非暴力变革不能不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问题。只有这样，中国的非暴力抗争才

能打开突破口，迎来历史性的转折。

## 一、四种模式的回顾与反思：中国公民抗争最大的困难和挑战究竟是什么？

当下公民抗争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是十分明显，也是不言而喻的。在中国的互联网里，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空间了，一切跟自由民主宪政理念、公民维权实践有关的言论，一旦出现基本上就被瞬间扼杀，注册多少个帐号都被屏蔽。中国社会的物理空间早已网格化，有任何动静基本上都被中共政权的维稳机器迅速绞杀。民主党创始人王有才承认，现在中国的民主运动以及公民运动已经到了历史的最低谷。然而，比这更残酷的现实是，国内公民维权基本上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下面，我简要回顾过去这些年我亲自参加过或者亲眼目睹过的标志性维权运动，概略分析其成败得失的关键原因，以为今后的非暴力行动提供更可行、更有效的方针和策略。

### 1. 唐荆陵律师的非暴力不合作行动

2008年我在广州时，就经常跟唐荆陵律师当面交流探讨，我钦佩他在番禺太石村维权事件中的勇气和行动力，后来我看到他名片上写的甘地非暴力理念时，还是有点惊讶，我指出：百年前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虽然有阴暗的一面，但那时的印度还允许存在罢工、罢市及抗税行动，英国殖民统治者起码还是遵从普通法的程序正义，这两点在近百年之后的中国都不存在，至今都不存在，中国既不存在独立的工会，所谓的工会不过是中共政权在工人群体中维护并巩固其统治的道具；另外，中国根本不存在司法独立，一般民事刑事小案法院负责人说了算，稍微大一点的案子，尤其是涉及政治的案子，都是政法委书记说了算，结果早就内定，法官只是走过场的工具。

我跟唐律师说，作为基督徒，甘地的非暴力理念我是天然认同的，但具体方式与策略，恐怕不能照搬，因为中国的民情社情国情，跟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实在相差太远了，大凡英国殖民治理的地方，还是有相对公正的法治，以及基本的人权和自由的，当时印度还存在罢工抗税本身就能够说明这一点。如果罢工这种方式竟然在中国能搞得起来，那中国的民运人士甚至都不用流亡海外了，因为中共统治之下，根本就不存在罢工的可能性，即便偶尔有零星的罢工，全部都是瞬间就被中共政权给扑灭了。最最根本的还在于，英国人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的性质，跟同期的香港是差不多的，本质上都是英国人培养出来的本土行政及法律精英们的高度自治，经济社会的高度自由，加上英式普通法的司法独立。讲白了，英国人并不依靠谎言暴力或意识形态来统治香港和印度，这跟中国是由一个像共产党这样高度集权的意识形态政党的暴力专制统治存在本质的不同。

后来唐律师发起赎回选票行动、五千天告别专制倒计时行动，以及在地铁举牌呼吁官员财产公开等等，我都佩服他的勇气，但当时我就认定他的方式不对头、不对路，那些主张基本上无法引起多少人的共鸣，更无法获得普遍认同，自然就无法持续。顺便插一句，那年有次我带唐律师去了中国家庭教会的一面旗帜——广州林献羔牧师的教会聚会（林牧被亲切称为林伯，为基督信仰坐牢长达二十余年），后来我离开广州，跟他失去联系，听说他成为基督徒了。再后来重新联系上，获悉他坐牢出来后就被困在湖北老家了。

唐律师主要靠“地面部队”单兵作战，即跟黑暗腐败不公的地方政权直接交锋与抗争，但由于团队人数太少，其无法持续是难以预计的。但无疑，在当年的条件和环境下，他的非暴力行动还是具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其无畏的勇气和牺牲精神永远值得铭记。

## 2. 零八宪章运动

我参加了第三批签名。必须坦诚，我不是因为认同其手段、策略、途径，而是认同其目的，就是明确宣告要实现自由民主宪政的中国而参加的。在当时，就我所知，中国还没有哪一个政治运动比零八宪章更让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心动。然而，从一开始我也十分清楚，中共政权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结构化的政权，有其系统化的意识形态、舆论宣传、统战渗透、历史叙事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理论体系及完备的国家暴力机器作为坚实的支撑。因此，松散的网络活动可能一时能造成一定的声势，但具体而言对现实社会带来的实质性影响是十分有限和短暂的，因此，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作用。

论参加这次活动的成员的结构，零八宪章当之无愧是来源最丰富、阵营最“豪华”、地域分布最广泛的政治运动。几乎汇集了当时知识界学术界、媒体界、公民行动界、法律界、NGO 及社会各界追求自由民主宪政非常有代表性的进步力量。然而，由于这个运动本身缺乏严密的组织性、结构性，在专横的中共政权面前的抗打击能力是十分脆弱的，这也决定了宪章运动是无法持续的。

此外，零八宪章运动的局限性也在于，只有“空军”在互联网空间以及来自海外的“海军”发生，而无像唐律师那样的“地面部队”进入社会实地空间直接跟有关部门进行抗争，因此，其在国际上上的影响很大，但对于国内实质性的影响和改变，几乎可以忽略。

## 3. 许志永博士的公盟维权运动

2009 年夏天，我以社会公益界特别代表的身份，获邀请前往北京参加公盟的维权实战研讨会。2003 年许博士就连同另两位法学博士动议废除收容遣送恶法，此后，在北大法学院贺卫方教授等 5 位

学者的推动下，收容遣送恶法当年就被废止，这是中国法治进程的一次标志性事件。其后，许博士又以独立候选人参选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获得成功，极大鼓舞了公民人士。当时公盟还做了全国许多社会底层人士维权的案子，大多获得不错的效果。那次研讨会，我见到了温和厚道侠义的夏霖律师，以及其他众多学界及公民维权人士。当时普遍弥漫着一种乐观的气氛，与会代表大多相信在现有制度框架内，通过理性、脚踏实地、技术性的手段，一个个细分领域见缝插针，坚持行动，终有一天会改变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期间有次饭后分组交流时，有位独立参选人大代表也获得了成功的人士强调了“日拱一卒，功不唐捐”的理念与策略。事实上，到当时为止，这一策略还是相当有效的。

然而，我提出了跟几乎所有人不同的看法，我指出，那些公民维权个案都是可以做的，现有制度框架下能尝试的都可以尝试，这些都挺好，但有些问题始终是绕不过的，迟早是要面对的。我的意思很明确，中国社会的许多现象是症状，而产生那些症状的病根、源头，制度才是最核心的东西，而制度的理论基础，才是最终要面对的最大问题。有位仁兄明白我的意思，当即跟我说，要少谈主义，多解决实际问题。但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才是产生中国一切政治恶性肿瘤及种种社会弊端的最根本原因（当然，文化也不可忽略，但不能以文化方式解决制度问题，二者不可替代）。我明确表示，我的思路是：既要研究主义，也要解决问题，要两条腿走路，并且，其实中共政权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本身就是中国政治的最大问题，这么大的问题，怎能视而不见，怎能不去先解决它呢？

我人微言轻，基本上没有人能认同我的看法，当然，这些我都能理解。毕竟，每个人的思维方式、理解方式不一样，成长背景和经历也各不相同。但我坚持认为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我们共同面对的：我们都生活在共产专制制度下，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这个中共

政权的理论基础永远是无法绕过的坎。当时，我只是觉得许博士的这条路子会比较艰难。至于“日拱一卒”，理论上也没错，但中国这么大，需要维权的个案那么多，光靠他那么几个人，得拱到什么时候呢？不首先把目光聚焦在产生这么多侵权的根本性制度上，而是仅仅着眼于解决一些表象问题。我觉得这个路子不对头，但是我完全没料到的是，第二年公盟就被北京税局一次查税一下子就查没了，更没料到的是，现任中共总书记上台后，中国的公民抗争环境急剧恶化，形势急转直下。再后来，所有既有框架内的一切行动空间，基本上被悉数堵死了。

许博士的公盟维权行动，比起“单兵地面作战”的唐律师及主要依靠“空军力量”的零八宪章运动，在许多方面都有明显突破和提升，已经发展为“地面部队”突击到纵深，“海陆空”三军协同策应的局面。“地面部队”日拱一卒式为来自全国各地的访民一个个地做维权个案，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在独立参选人大、教育平权、出租车行业行政垄断等社会各个具体领域，像一口口尖针一样见缝插针地插进去，学术界占领理论制高点给予支援，媒体界协同学术界在互联网空中进行策应，辅以海外自由民主力量“海军”的声援和呼应。一言蔽之，许博士的公盟维权行动，大概是迄今为止唯一既有实际成效、又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行动。

然而遗憾的是，公盟维权刻意选择不面对中共政权的七寸（即中共政权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中共政权内黑恶势力的毒蛇，只需要咬公盟一口，就足以致命，公盟就难以继。这不能不说是对所有非暴力仁人志士的惨痛教训。

### 对上述三个非暴力运动案例的基本总结：

唐荆陵律师跟许博士一样，都心地善良、纯粹，都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非暴力的理念，以及坚毅、勇敢、执着、脚踏实地行动的态度，还有不畏强权、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等等难能可贵的精

神。在我所亲自接触及了解的范围内，尤其是许志永博士，可能是中国最具备新一代政治家气质的仁人志士，也是最具有非暴力政治领袖潜质的先行者，并且，他的行动曾取得过许多历史性的成功，一度看起来也离未来的成功最近。唐律师跟许博士，可以说代表了“地面部队”，而零八宪章运动则汇集了当年中国理论学术界最强大的“空军”阵营，在整个过程中，来自海外的自由民主仁人志士的“海军”，都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这三支力量，基本上代表了追求自由民主宪政力量的海内外华人的“海陆空三军”。从单兵作战能力上讲，这“三军”许多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可惜的是，这“三军”不能在同一个明确的目标、方针、路线、策略下联合起来，不能拧成一股绳，无法发挥应有的最大的能量和威力，这样一来，就难免被中共专制强权轻而易举地一一攻破了。

最根本的在于，如此具有单兵作战能力的“海陆空三军”，竟然没有一个对中共政权的七寸（即中共政权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施“狠准稳”的精准打击，如此一来，就无可避免地被中共政权内黑恶势力的毒蛇反咬了，只要被反咬，后果也就不难想象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或未来，这是对所有非暴力仁人志士的最惨痛最深刻的教训。本文后面部份，我将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终极解决方案。

#### 4.香港反送中运动的三层启示

香港反送中运动（或曰反修例）从 2019 年 3 月开始爆发，到 2022 年 10 月被港共警察政府全面镇压下结束。运动最高潮时，高达 200 万香港市民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去掉两头的老少，差不多一半香港成人市民参与。论参与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都创下了反抗中共专制暴政的历史记录。作为曾经的华人自由社会的堡垒

和榜样，香港及反送中有太多令人感叹的启示，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有三个层面，每一层都对应着香港与中国大陆的对照。

首先，在过去几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中港人表现出反抗专制与暴政的决心、勇气和行动力，实在值得所有渴望自由民主的中国大陆人钦佩。面对中共专制政权支持的香港警察政府的打击、镇压与诽谤，香港市民不屈不挠，一次又一次走上街头表达诉求、进行抗争，这说明了香港人的自由观念及权利意识已经普及到了很高的程度，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与自由，香港人可以怎样、以及付出什么样的行动来反抗暴政。从这一点上讲，中国大陆民众跟香港市民的差距简直不能以年代算。反过来讲，当下的中国大陆也根本不具备香港社会的抗争条件，物理空间早已网格化，互联网空间全天监控无死角，无处不在的国保国安与警察，维稳经费早已超过军费，综治维稳中心遍及乡镇街道办，中共专制政权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十四亿民众的思想和灵魂，从百亿千亿资产超级富豪到草根百姓，都如中共政权砧板上的鱼肉，基本上动弹不得。不要说 200 万市民走上街头这样的空前壮举，就是哪怕两千两百市民上街游行示威抗议的现象，在当今中国大陆任何城市都是无法想象的。然而，最多时 200 万人上街，搞了近三年又如何？不得不说，在中共专制政权面前，反送中运动还是太脆弱了。

其次，由于这次社会运动并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治目标，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与纲领，更没有系统的战略与策略手段，在高度极权专制的百年意识形态政党中共面前，最终轰轰烈烈地失败也不能算意外。反送中的骨干们还是太年轻了。但这些骨干背后的推动者并不年轻，例如香港民主之父李柱铭先生、传媒企业家黎智英先生，还有反送中后续的海外香港议会的领导人实业家袁弓夷先生，这些反抗中共专制暴政的幕后大佬都是久经政界历练或商场摸爬滚打，游历世界各国，人生经历丰富且见多识广的人之豪杰或精英中的精英，拥有丰富的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在西方国家政府及议

会也有广泛的支持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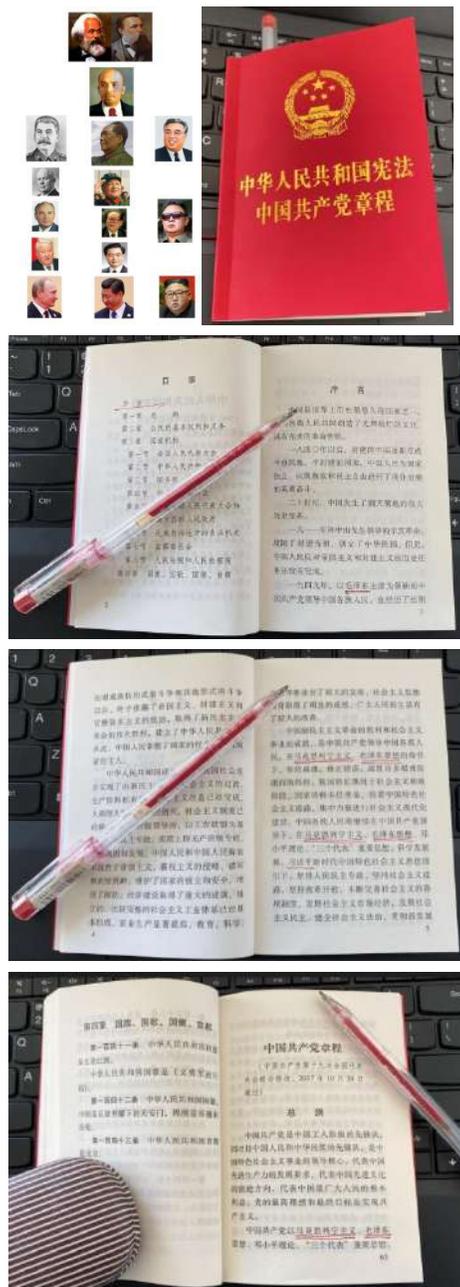
然而，这又能把中共专制政权如何？随着过去二十年中国大陆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过去使用了好些年的通过西方国家政府和议会向中共政权施压或制裁，这一招已经不好使了。不仅不能取得实际效果，每一次对中共专制政权的施压与制裁，就相当于增强了其反制的抵抗力和免疫力。这也表明，香港反送中的骨干及背后的推动者，并不熟悉中共政治斗争的模式，他们大多不真正了解中共的理论源泉、发展历史与斗争策略，甚至根本没有搞清楚中共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政党，就像过去二十多年香港各种政治与社会运动所展示的那样，跟在血雨腥风的历史中走过来的中共的斗争永远只会停留在幼稚园的阶段和水平。

最后，香港的自由民主法治的沦陷，加快向着中共政权专制模式方向靠拢，表明一个残酷的事实：凡中共官僚特权专制政权的黑手所及之处，就原本自由的香港而言，从自由到专制是何等地容易，就一直处于专制的中国大陆来说，从专制到自由是何等何等的艰难。

###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究竟什么才是最大的困难与挑战？

如前所述，无论是中国大陆公民维权运动的“海陆空三军”，还是作为自由堡垒和旗舰的香港，所有抗争无论成因、诉求、表现形式及过程如何，都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都没有打到中共政权的“七寸”。这就造成类似本文开头那个比方所说的情况，一对大学教授夫妻结婚多年未孕，不是因为没同房共事，忙活了 N 年，而是因为没找对地方、没找到门路。

中共政权的七寸，在下面这组图里，在决定中共政权的来源、性质、目的之两份重要文件里。



优秀奖 就用常识的方式，开创千年未有之非暴力变革新局面

也隐藏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遍及每个角落的下面这些招牌后面：



注：街道办的行政级别相当于乡镇，只是比村高一级，是中国政府行政级别的最末端。全中国街道办/乡镇政府门口都同时挂着至少五块牌子：党委、政府、人大、纪委、人武，这明确象征着中共政权的党大于一切、党领导一切、党政合一、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与权力结构。

豪华气派的街道办大楼中国遍地可见，想想：中共专制政权的机构臃肿、人员庞大到了什么程度！（图片来源于网络）



美国那么多州政府、市政府办公室，有没有中国最低一级的基层村委/社区委员会办公楼豪华气派？（图片来源于网络）

由此不难看出，无论是海内外的自由民主运动，还是公民维权

抗争行动，其实最大的困难不是别的，不是中共专制政权的暴力与维稳机器太强大，而是无法认识到中共专制政权的七寸和软肋在哪里。最大的挑战不是别的，而是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有效、彻底地搞定中共专制政权的七寸。

这就是早在 2008 年，我对唐律师说过不能照搬印度的非暴力模式，也是 2009 年我跟许博士提到有些事终究不能绕过，以及跟当时的某位仁兄说过“既要研究主义，又要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中共专制政权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也是中共专制政权的七寸。

中共专制政权的现实就是这样：你跟他们讲法律，他们跟你讲政治；你搞维权，他们把你维稳；你举牌呼吁官员财产公开，他们说你扰乱公共秩序；你倡议普世价值，他们直接把你专政。中共就是法律，总书记就是最高大法官，他怎样修宪都行，但你要是跟他们讲修宪，他们就说你颠覆政权，直接判你十几年。

那么，他们究竟仗着什么为所欲为？他们究竟凭着什么无法无天，每天都在肆意践踏甚至他们自己制订颁布的法律？归根结底，不还是他们手里握着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这个紧箍咒？既然追求自由民主的公民维权界仁人志士们怎么做都是被打压、被构陷颠覆政权而坐牢，那还不如干脆把被中共政权颠倒了了的再颠倒回去，还不如干脆直截了当地把中共政权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毫不犹豫地扯开，还不如干脆把具有中国特色新时代皇帝的新装公开说破。

其实，在 2008、2009 那两年，我已经充分做好了投入公民行动而坐牢的心理准备，我甚至都已经跟我父亲明确说了，万一我这个儿子没了，他还有四个。然而，后来我看到公民维权界那么多仁人志士，没有一个对解决中共专制政权的七寸感兴趣的，几乎没有碰到一个理解并认同我的，如此，我意识到：如果我因为反抗中共暴政坐牢了，不能引发成千上万的人跟我做同样的事（直接搞定中共政权的七寸），那意义何在呢？对于推动中国向自由民主宪政转变

能带来什么真正的改变，能起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呢？一个秦永敏要坐 30 年，一个王炳章要坐 21 年（如果中国不变天，看来可能要把牢底坐穿），一个刘晓波要坐 11 年，一个任志强要坐 18 年，一个孙大午要坐 3+18 年，一个许志永要坐 4+14 年，但如果一切自由民主仁人志士们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中国国内涌现出成千上万个秦永敏、王炳章、刘晓波、许志永、任志强、孙大午，如果有一万个仁人志士同时不怕坐牢，那么，他们可能最多坐一年，如果同时涌现出十万个仁人志士，那么，他们可能进去六七个月。中国这么大，14 亿人口，难不成没有十万个勇于行动的仁人志士？

这也是 2009 年后，我基本上就没怎么直接介入公民维权行动第一线，而是在侧翼或后方以力所能及的方式提供支持的主要原因所在，例如，有些维权机构被税局罚款百万，需要紧急筹集罚金，我及时尽力捐款以解燃眉之急等等。以及，为了今后非暴力的变革做理论上及思想上的准备。他们在牢房里奋斗，我在书房里战斗，十年磨剑，锻造“批判的武器”，为了今后与仁人志士“海陆空”三军会合，以进行有效的“武器的批判”，使中国的非暴力变革早日开创新局面，早日促成历史性转折，以使他们早日出牢房得自由。

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虽然属于一种“类地心说式”“类盲人摸象式”的理论和信仰，但马克思的许多见解却是十分精辟和有道理的，典型的例如：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对于中国的国情而言，我还得补充一句：反过来说，武器的批判也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而以唐律师许博士为代表的公民维权界的“海陆空三军”中的“陆军地面部队先锋”最大的失误，恐怕恰恰在于尝试用武器的批判去代替批判的武器，换言之，只着眼于细枝末节的维权案例这些技术性芝麻，而忽视了中共政权七寸的那个战略性大西瓜。

而作为中国泛公民运动的“海陆空三军”中“海军”的海外民运人士们（其实完全可以形成至少五个航母战斗群），由于他们身在自由民主法治和保障人权的北美、西欧及澳洲，完全不存在像唐

律师、许博士等等仁人志士那样需要在中国大陆跟中共官僚特权专制政权进行一线的直接“地面作战”，他们完全没有失去人身自由的风险（除非像王炳章博士那样反向润向中国），他们最有条件把解决中共专制政权的七寸的批判的武器打造好，并对中共政权的七寸（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从“海上”“空中”进行致命的武器的批判，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没看到这样的迹象，目光所及更多似乎是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不是不能搞，问题是，在中共这样一个以恐怖暴力起家，如今又靠暴力加谎言维持其统治的极权专制政权，行为艺术的实际作用与效果，跟在屠杀以色列儿童孕妇老人的哈马斯恐怖武装面前摆弄玩具 AK47 有什么本质区别？

### 关于公民抗争最大的困难和挑战的基本结论：

由此可见，无论是海内，还是海外的自由民主运动，或是公民维权抗争行动，其实最大的困难和挑战不是别的，并不是外部的环境与条件，而是自身的认知、理解、思维、心胸和格局。

客观上而言，中共政权已经异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政教合一的皇帝新装的最高阶段，已经异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僚特权专制极权的新国家资本主义阶段，然而，其拥有的强大的民营经济力量是前苏俄帝国根本不具有的（创造就业、纳税、出口均超过70%甚至更多，仅仅一两个不拿国家投资白手起家的民营互联网高科技企业为工人农民阶级创造的就业，比整个党营官营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就业的总和还多得多），其拥有的控制人民思想言论的互联网人工智能高科技手段，以及其意识形态及宣传舆论部门对亿万民众洗脑灌输的成功，是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欧洲以及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权无法想象的，其一党独裁专制所能运用的集9800多万党员、十多亿人口的综合国力下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统战工具和资源，是任何自由民主国家两党或多党轮

替的任何一个政党都远远不能企及的。

这就决定了，如果仍然按照过去三十多年的老思路与老办法，一切海内外的自由民主或公民维权力量，都丝毫无法改变这样一个极权专制政权的诸多客观因素，不仅改变不了，任何不对头、不对路的思路和方法，反而只会增强中共政权的抵抗力、免疫力与反制能力，这是过去三十多年来毋庸讳言的历史经验和惨痛教训。中共极权专制政权并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变成现在这样的，而是在对内与对外的种种互动与张力的合力下，包括国外的民运及国内的公民维权抗争，才形成了目前的局面的。

这就决定了，一切海内外的自由民主或公民维权力量，只能转变自身的认知、理解、思维、心胸和格局，并相应转变思路和行动策略，唯如此，今后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宪政才有可能开创新局面，才可能出现历史性的转折。不然，恐怕再过三十年，中国也很难有实质性的改变。

转变认知，首要的就是要认识到对于中共这样的专制政权，要么就不玩、要么就不动，要玩、要动就玩真格、动真格的，要动就直接瞄准中共专制政权的七寸，并且要实施降维打击。后面的部份我会论述这个降维打击的具体思路和方法。

中共政权这种高度类政教合一的意识形态专制极权政权，决定了一切去中心化、无组织化、零散的、偶发的事件和运动，甚至都伤不了中共政权这个庞大机体的皮毛，这就决定了未来中国的非暴力变革的方程式，万变不离其宗，必然脱离不了这样的铁律：思想运动开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组建联合团结的统一政党→争取自由民主及权利的抗争与斗争→最终实现一个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中国。

都这么多年了，如果现在还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如果还不痛彻心扉地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如果还对罢工、罢课这类英国殖民地才合适的抗争手段存有念想，还想着成千上万的人穿上某种颜色的衣

服走上街头就能改变中共政权的颜色和底色，那恕我直言和忠言，跟中共政权的斗争就永远只会停留在幼儿园的阶段，哪怕再过两个三十年都会造反不成。

香港的众多民主运动大佬们，例如香港民主运动之父李柱铭先生，先从服装实业转身进入传媒业而后进入政治运动的黎智英先生，他们无法意识无法认识到这一点还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们是在港英殖民统治的充分自由和公正的法治环境下成长并成功的，但在中共的马列毛教育和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大陆自由民主和公民维权仁人志士们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那未免就太可惜太遗憾了。

讲白了，当年中共怎样走过的路（建党→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一切自由民主进步力量，最终也无可避免也要走一遍（建党→非暴力变革→优化政权），唯一不同的是绝不采取暴力手段和流血的方式，第二个区别是不以共产主义这种乌托邦而是以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的实现为奋斗目标。不能因为中国民主党一次两次建党不成，就认定这条路走不通，那只不过是民主党等其他带有自由民主概念的政党的思路和方法不对头，并且没有解决中共政权的七寸罢了。

## 二、两个案例：对两类典型认知偏差的分析

上面我已经指出一切海内外的自由民主或公民维权力量最大的困难和挑战，并不是客观环境与条件，而是其自身的认知、理解、思维、心胸和格局。下面我简要举例来说明。

### 1.动态清零政策的终止，真的是由白纸运动导致的吗？

前两个月，我在简中推特上注意到一种说法，认为中共政权的动态清零政策是由白纸运动导致的，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时，我挺惊讶，后来又陆续从不同账号听到同样的观点，我才意识到这种观点在海内外泛民运及公民维权人士中不是个别现象。

疫情三年我一直在国内，我十分清楚动态清零政策终止的原因根本不是这样。真正的原因是，动态清零政策给中国的经济社会运行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外资供应链加速撤离，大量民营企业倒闭，失业率创历史新高，外贸出口、国内消费、投资基建三驾马车全部失灵，这导致税源严重失血，给中共的统治造成了根本性的危机。但这还不是最最关键的原因，因为中共这样的极权专制政权根本不存在需要对选民负责的问题，更不存在所谓的有效监督，即便动态清零政策带来了如此大的损失，受损失最严重的民营经济界的大小工厂公司商户，也没有出现像样的反抗，如果动态清零政策继续下去，实际上社会各界拿中共政权也没办法。事实的真相是：由于无止境的折腾，中共各级政府部门，尤其是地方基层政府及医疗系统，早已不堪重负、根本就吃不消，无论是从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都难以为继了，这才是动态清零政策终止的真正原因。

过去十多年，我一直住在两个特大型省会城市的大学城附近，几乎每周我都在大学城穿梭，我走得近的朋友中，本身就有不少大学城的老师，我的社交圈子也不算狭窄，可以说，事实跟海外人士想象或从网上看到的正好相反，白纸运动在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人关注，也极少有人谈论，即便偶尔有，也就像一个小小的插曲，像一阵风一样就迅速散去了。之所以造成一些人士认为是白纸运动导致了动态清零政策结束的错觉，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脱离了中国的社会现实，不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加上类似“幸存者偏差”那样的认知错误而造成的结果。

不妨反过来想想：给中国的经济社会运行造成天文数字级别的损失都不足以改变中共政权最高统治层的决策和意志，而仅仅靠一些偶发性、无组织、无明确政治诉求、相当含蓄的学生行动，就能让如此顽固的中共极权专制政权最高统治者回心转意，既然如此，那中国社会的许多重大事情岂不是多搞几次白纸运动就可以轻易改变了？当年中共在天安门是怎样用机枪坦克对付手无寸铁的学

生的？现在的中共即使对自己人——仅仅是委婉表达不能武力攻台的军方将领都将其人间蒸发？难道仅仅因为一些学生举起白纸，中共的江山、本性和本色就都突然改变了？天下真有这么简单的事吗？

从这个事情，也可以看出相当一部份脱离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二三十年的人士，对于行动与结果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符合实际情况的认知与分析，这就造成认知偏差，必然得出偏差的诊断，而偏差的诊断必然开出偏差的药方，结果必然是不对头、不对路。

## 2.如果要帮中共的大忙，恐怕没什么比这种思路和主张效果更好的了。

不知道具体有多久了，海外一直存在分省或联省独立的声音，这种声音在海外似乎颇有市场。在自由民主国家，只要不是纳粹主义、恐怖主义、种族歧视，言论自由就可以得到保护，各种思想观点都允许存在，不管是真的有这种想法，还是作为一种情绪的表达或者姿态的展示，都完全可以理解。然而如果放在中国真实的社会环境中，则肯定没有什么群众基础了。即便加拿大的魁北克省、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甚至美国的德克萨斯能够获得独立，也不意味着中国的分省或联省独立有任何现实可能性，因为中共政权的性质跟上述国家的政府性质根本就不同，人家可以搞公投，中共只讲拳头，谁的拳头硬得过、赢得过中共？如果不信，只管去试。

这里，我只想提醒一两点：稍微回顾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是没有过南北或东西分裂甚至四分五裂的时候，但整体来看，在统一与分裂这两种历史发展选择里，究竟哪个是绝对主流？哪个的时间占绝对优势？再者，人类四大文明古国，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我想，只要稍微认识到这两点，就不难意识到：除非中华民族将要灭亡了，个别省份或联省独立才有可能。然而，存在中华民族将要灭亡的可能性吗？

今年夏天北方那么大的洪水，成千上万农民的房屋农田被毁，财产损失不计其数，那样生死攸关的时刻，当地市委书记市长集体失踪，政府部门的物资堆积如山，但农民跪求食物饮料，有关部门就是不给，成千上万小汽车堵在高速公路入口处迫切等待逃生，但公路管理部门就是不放闸。性质如此恶劣严重的政府灾情管理失职，换在任何稍微正常一点的国家，都会造成严重的执政危机。然而在天朝这样的神奇国度，如此严重的洪水危机，竟然被日本一次核废水排放就轻而易举地转移了。如今，网上还有谁关心北方那些灾民？

毋庸置疑，中国任何省份或联省搞独立，不仅毫无成功的可能性，反而在客观上相当于是帮了中共政权的忙，中共政权最需要这种概念、题材或者说外部的敌人来转移其内部的矛盾，以达到巩固其政权、维护其统治的目的。关于这一点，除了现实的警示，也不乏历史借鉴。中共政权本身极度缺乏合法性的资源（甚至根本就没有经得起推敲的合法性），试想：任何分省或联省独立，姑且先别提成功的概率，只要中共政权的宣传机器稍微开动一下，不正好为中共政权提供了类似日本搞九一八的题材，间接增加中共政权的凝聚力，帮助中共转移内部矛盾并巩固其政权，不正好帮了中共的大忙吗？

退一万步，就算百万分之一的机会分省或联省独立成功了，难道就必然意味着那些获得独立的省份能走向自由民主和宪政？答案不言而喻。可见，根本性的问题不在于这里或那里独立，而在于透过全面彻底的政治变革，把中国转变为一个真正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如果将来中国的每个省都像现在的台湾或韩国那样政治充分自由民主，经济高度繁荣发展，人民的生活有尊严有保障，各地还有分离的必要吗？

因此，分省或联省独立，出发点在于削弱或瓦解中共政权，但实际上真的搞错了斗争的方向，不仅没有丝毫可行性，反而会帮中

共政权的大忙。

### 3.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如何衡量行动与效果之间的关系？ 以及内因与外因究竟哪个更重要？

如前所述，由于与中国现实社会的真实情况脱节，一部分人士产生认为是白纸运动导致了动态清零政策结束的错觉，这种认知，同样也可能造成其他方面的错觉，典型的就是对自身行动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关系认知的偏差，与此并发的，也可能把变革要素的内因跟外因的重要性混淆错置。

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动用外部力量对中共政权内部施压方面，可能没有谁比香港民主之父李柱铭先生的历史更悠久，恐怕再也没有谁造成的影响比余茂春先生所造成的影响大了。

通过影响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政府及议会，以达到对中共政权进行施压及制裁的反共路径和模式，可以说有作用，也可以说实际上没什么作用。说有作用，是因为这种路径与模式，的确看似限制了中共政权的某些能力，例如高科技领域所必须的芯片等，这使得中共政权在关键的军事科技领域的发展受阻三五年甚至更长，或者迫使中共政权付出更大的代价。说实际上没什么作用，是因为这种外部的压力，不仅不能削弱中共政权内部的凝聚力，客观上反而强化了中共政权的统治，道理很简单，中共专制政权并不需要对自由民主国家的选民负责，它不需要对中国人负责，其权力也不受任何人的约束，它的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反而可以利用这一不利的外部环境，树立一个明确的敌人，操控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增强其内部的凝聚力，以巩固其统治，实际上，中共政权就是这么做的，并且做得一贯很成功。

人类政治变革史可以证明一个基本规律：外因只是诱发性、催化性的，内因才是决定性、根本性的，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的。如果把内因跟外因的关系搞反了，势必会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从这

个意义上讲，今后中国的社会变革，应该越多发动国内民众、依靠国内民众的力量，讲白了就是要千方百计地转化国内民众，以获得越来越广泛有效的群众基础。只有国内的工作做足做到位了，再借助外部的力量，才可能产生实际作用。所谓天助者自助，打铁还需自身硬，堡垒必须先从内部攻破，正是这个道理。

不能一味地认定为中国创造就业、纳税及出口创汇均超过 70% 的民营经济人士都是软骨头，不能一杠子扫翻一船人地认为中国所有知识分子的脊梁都被打断，也不能一味地认定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者全部都是无可救药的脑残，他们就是我们的父老乡亲、骨肉同胞，更不能认为所有中共政权体制内的官僚都是一模一样、都是坏事做尽无恶不作的秦桧主义者、魏忠贤主义者。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真的不要怨别人软骨、脑残，也不要老是强调共军太强大，相反，还是要反思为什么不能成功转化他们中间那些能够分化和转化的人。

没错，道不同不相为谋，但一边吸引、寻找志同道合者，一边转化一切可分化和转化的力量，两手都要抓，两条腿走路，这并不冲突和矛盾。想想当年中共是怎样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吧！我个人觉得，真的还是要虚心一点、谦卑一些，中共虽然大多已经异化为其对立面，但作为一个从血雨腥风残酷斗争走过来的百年老党，无疑他们 1949 年前的许多成功经验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只有学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促成合作者越来越多、竞争对手越来越少的局面，并转化分化一切能够转化分化的力量，自由民主跟专制极权的力量对比才能可能出现历史性的转换，中国的自由民主进程才会迎来历史性的转折。

意识到这些，就会更加冷静地直面一个现实：一晃二三十年过去了，究竟海内外自由民主力量在国内拥有多少真正的群众基础？如何像一个半世纪前的马克思那样，即使人死了还有人不断按照其世界观体系认识世界并持续自发组织起来改造世界（并非要学习其

暴力革命)。如何像当年的中共那样在宣传组织策动等多个方面，就是在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理论联系实际这两方面都获得实质性的成功？如何像当年的中共获得越来越广泛的群众基础，甚至把国民党的人都转化为自己的人？这些才是决定今后中国自由民主生死攸关的问题。除非就是只想一门心思搞定自由民主国家的政府议会和机构，或者就是要沉浸在行为艺术、“幸存者偏差”那样的主观感觉中，而对国内的群众基础丝毫不感兴趣，那么，以上问题都是不能不高度重视、不能不认真思考、不能不千方百计去解决的问题。反过来说，如果对国内真实的群众基础丝毫不感兴趣，其实就相当于对未来中国的自由民主进程实际上不感兴趣。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几十年如一日地搞民主呢？



### 三、由此得出中国非暴力公民抗争实战的新思路、新方向及新策略

以下，本人提供三个版本的公民非暴力抗争实战的新思路、新方向及新策略。

#### A 版本，低配版：以言论自由作为切入点、突破口

如果一定要把自由（思想、言论、出版、新闻、信仰）、民主（各级各类选举程序及制度）和宪政（分权与制衡）这三个价值做个优先排序供选择，那我毫无疑问首选自由。在各项自由中，又以思想言论自由为最优先最紧迫。在整个国内互联网上，已经毫无基本的言论自由，这毫无疑问是当下一切渴望自由民主的中国人的最大痛点，扼杀言论自由背后最大的黑手是中共专制政权意识形态管理当局，及其统领下的网监部门，以及沦为中共专制政权统治工具的各大互联网门户、社交媒体、社交工具及视频内容幕后的内容审查机器。讲白了，具体而言就是中宣部及网信办，这两个部门是互通的，其领导是互换或兼任的。当年中宣部一个人一句话，就基本上灭了南方系媒体，说中宣部相当于中世纪的真理裁判所，网信办类似于中国的网络沙皇，一点都不为过，他们罪大恶极，反动透顶，他们对思想言论自由的禁锢扼杀绞杀的性质，比中共政务系统那些大小老虎硕鼠们的经济腐败恶劣十倍百倍都不止。

无需隐瞒，我自己就是这个罪恶的审查制度及系统的多年受害者，数年前我研发了一套互联网社交软件，由于运营需要，配套运营了一个微信公众号。由于我的软件功能及用户特性，我的公众号内容绝不涉及时政社会热点，但即便如此，过去三年来公众号运营越来越艰难，每次辛辛苦苦写的文章经过腾讯系统严格审核后好不容易推送成功，瞬间就被恶意投诉而屏蔽了，虽然我知道申诉肯定不会成功，但我还是尝试了 N 次申诉，最后放弃了。我也认真找过

资深律师准备对腾讯公司发起诉讼，律师说这种案子法院根本不予受理，再说，我也没那个时间和精力跟腾讯公司耗。

每次我经过腾讯系统严格审核后好不容易推送成功的文章，然后又瞬间被屏蔽时，总会收到腾讯公司这样的通知：“你的公众号文章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被删除”，但至于究竟是文章的哪一句话违反什么法律法规的哪一条，腾讯公司就是不明确告知。之前我还有几个公众号被封号，收到的也是类似通知：“你的公众号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已被停止使用。”

三年前美国黑人弗洛伊德被警察活活压死时，抖音上有个自媒体帐号发布了一条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讲话视频，大意是“黑人的命也是命，中国政府敦促美国切实保护人权”云云，我忍不住在下面回复了一句评论：“讲得太好了，要是不照着稿子念，那就更好了”。因为那条视频里赵立坚几乎是每说半句就低头斜眼瞟视下面的稿子。我的评论当时成功发布了，但第二天，我就收到了抖音的通知，说那条评论因为违法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而被删除了。

过去三年疫情期间，尤其是俄乌战争爆发后，我亲眼目睹了无数本着基本良知与理性的分析和评论内容，一次次被屏蔽，一次次被封号，其中包括众多国内知名学者、律师界、媒体人、公民维权人士的帐号，至于其他类别有影响力的，以及不知名的，被这样屏蔽或封号的帐号，就不计其数了。与此同时，但凡胡叨盘、周带鱼、司马夹头及超级五毛大 V 占豪等等一切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歪曲事实的文章，却能总是能大行其道、畅通无阻，这让任何尚有基本良知和正义感的人无法不产生强烈的被压迫与不公正感。

毫无疑问，腾讯公司、字节跳动的这种行径才是实实在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更是违反宪法第 35 条之言论自由的原则和精神的。在我看来，每一次腾讯的微信公众平台对经过其审核而推送出去的文章的屏蔽，都是对公民思想言论自由与权利的剥夺，每一次这种情况下收到腾讯公司的通知“你的公众号文章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而被删除”，就好比马化腾收到法院这样的通知：“马化腾，你爹因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被有关部门执行了枪毙，至于你爹究竟是干了什么、违反了哪部法律法规的哪一条，有关部门就是不告诉你。”

以腾讯公司为代表的这种侵犯践踏公民思想言论自由的行径性质极其恶劣，其恶劣程度跟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其实是类似的，在我看来，腾讯公司每一次这样的恶行，甚至比一个中共三个代表大小老虎硕鼠贪腐一千万一个亿甚至更恶劣，他们贪腐千万上亿，本身就是他们败坏的报应，因为他们成了金钱的奴隶，但每扼杀一次自由，就是对公民正当的自由意志及思想灵魂的强暴。政府的罪恶归政府，腾讯的罪恶归腾讯，没有任何借口。

**行动方案：**互联网言论自由与权利被侵犯被践踏的千百万受害者联合起来，一致行动，要求腾讯、字节跳动及微博，在删除本身已经通过平台审核而成功发布的内容（图文、视频）的通知里，须明确告知究竟被删除的内容的具体哪一句、哪一段、哪一处违反了什么法律法规的哪一条，才被删除。封号更应如此。

**方案特点：**从务实可行的角度出发，本方案的诉求并不指望废除言论审查制度，而是要求互联网公司的言论审查本身应该符合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本身应该尽到依法明确告知的法定义务。这既是对写在宪法上的公民言论自由保护的最低要求，也是对有关部门及互联网平台违法行为的纠正。这一诉求，关系到千万计互联网从业人员的生计，跟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对此我有切身体会、切肤之痛。

**主要难点：**一旦联合行动，就必然要求一定的组织化，一旦组织化，就触犯了中共政权的大忌，就会面临中共政权的残酷非法打击和镇压，中共政权肯定会枪打出头鸟、杀鸡儆猴。但如果不联合行动，则言论自由这个最最基本的自由永远会处于被肆意侵犯和践踏的地步。一旦组织化，组织者、牵头者、主要召集人就必然面临

重大的人身风险。谁家没老没少，哪个成了家的没夫没妻？哪个人的自由不宝贵？这看似是个悖论，但本文后面会有对这个悖论的终极解决思路和方法。

不自由，毋宁死，如果连最最基本的言论自由都没有，人活着跟韭菜和咸鱼有什么区别？天下苦非法言论审查久矣！千百万互联网从业者苦中共网络沙皇久矣。顺便说下，那位三个代表里的中国网络沙皇鲁炜，曾经的新华社副社长、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市副市长，最后担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兼国家网信办主任期间，彻底暴露了其贪腐硕鼠的本质，这位三个代表中的硕鼠代表作恶多端、良心坏透，是具有中国特色新时代江青主义者的典范，最终多行不义而落马了。虽然这个良心坏透、恶贯满盈的三个代表里的中国网络沙皇彻底完蛋了，但邪恶的中共专制政权的言论审查制度丝毫没有改变，一个鲁炜倒下了，还有成千上万个鲁炜那样的三个代表活跃在中共党务系统的宣传部门里。成千上万个鲁炜那样的三个代表们所仗着的一整套邪恶的言论审查制度与机器，正是互联网信息时代维护中共专制政权最重要的工具。作为这个邪恶制度多年的受害者，这也是本人费尽千辛万苦，非得要把这篇六万余字的长文写出来、并发表出来的重要动力之一。

## **B 版本，中配版：去掉《宪法》中违反宪法精神及法治原则的因素**

**行动方案：**要求用明确、具体、无可争辩的法律语言及逻辑，来解释宪法里的一些名词，例如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例，《宪法》应该解释究竟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我不知道究竟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但我手头正好一份 1974 年的中共中央红头文件，根据这份文件黑字白纸的证据，毛泽东肯定是尊崇秦始皇、反对孔孟儒家思想的。假如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构成要素，那么，《宪法》就应当把这一点包含进去。

我不否认中共中央拥有对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独家和最高解释权，正因为如此，《宪法》应该对于什么是、什么不是“毛泽东思想”应该具体解释和说明，不然，就会产生混乱，让人无所适从。

既然依法治国，那么，就应该按法治的原则把《宪法》术语及条文明确化，不然，那还怎么叫依法治国呢？那岂不是彻头彻尾虚伪的法治，实质是赤裸裸的人治了？

**方案特点：**本方案旨在尝试通过理性逻辑与法治思维的方式来消除中国《宪法》中反宪政、反法治的因素。中共和国宪法其根源明显是以政治代替法律，或以政治僭越法律。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政治学、政治哲学本身是极不确定和十分主观的，因此也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而法治的原则却可以也必须是相对客观的、稳定的，至少从形式上应当具备程序的正当性。本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真正的法治，应当是政治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中共自己也是这样宣传的，既然如此，除了“毛泽东思想”，更应当对究竟什么是《宪法》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法律上解释，因为毕竟马克思是一个活在遥远的一个半世纪前的普鲁士犹太人，并且是一个否认举世公认的古老犹太智慧与经典、数典忘祖的非理性犹太人。而列宁活在一百年前的俄罗斯，他按照马克思“盲人摸象式”的世界观建立的苏俄极权共产帝国早就崩溃解体了，他的思想已经被他们俄罗斯人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那么，这样的纸北极熊的历史垃圾，为什么竟然要放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宪法里？

**主要难点：**跟低配版方案类似；并且，还可能面临任志强先生、刘亚洲将军所面临的风险。岳飞被秦桧害死，彭德怀只是为3000万被老毛荒唐的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活活饿死的农民喊冤，也被老毛整死，至于被毛最后一任老婆构陷迫害的人，就更加多如牛毛了。自古以来直到如今的中国，善良正直者都可能被奸佞邪恶者迫害，但即便如此，这个世界总存在有良知的勇士。况且，中共党

员任志强都舍得一身剐，中共政权体制内的高级将军都表达出绝不能武力攻打台湾的不同的声音，那么，自由民主的仁人志士岂不更加应该勇敢地指出中共政权《宪法》里的一切违反法治精神与宪政原则的条文与规定？

### **C 终极版：建党→非暴力变革→优化政权→历史性地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2008年我计划写《国家的误会》小册子时，我就想到了要创立一个政党，甚至政党的名字、纲领都想好了。当时想了两个名称：中国进步党、中国社会进步党，后一个名称，我搜索到黎巴嫩已经有同名政党，并且名字有点长，还是中国进步党简单明了，也符合追求进步这一最大公约数的诉求和理念。

今年上半年，根据过去三年来的国际国内形势，尤其是俄乌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以及我来欧洲后的亲身经历、观察和思考，我把小册子换了一个新的名字《自由的代价》，原先《国家的误会》仍然保留，作为《自由的代价》的一部分。相应的，我想到一个新的政党名称作为备选：中华进步党。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整个地球”，而我的想法是：如果给我一个支点，我将发挥一切主观能动性、尽一切努力促成“中国行动”“公民力量”“民主教育基金会”“民主中国”“纵览中国”这五艘“航空母舰”组建一个团结统一的政党。

102年前，13个人在浙江嘉兴南湖一条游船上创立了一个政党，改变了此后中国乃至人类历史的进程。难道仁人志士如云、治国安邦人才济济的这五艘“航空母舰”，到了眼下中国千年未有之变革即将来临的重要历史关头（中共总书记都有这个历史意识，并且公开跟其最亲密的朋友纸北极熊特务头子说过），都还不能创立一个引领今后中国千年未有之非暴力变革的新的政党？

我一个无名之辈，何德何能，怎么可能促成这样看似不可能的

大事？当然不是我有什么能力，而是因为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不二选择，是一切自由民主和公民行动永远无法绕过的坎。除了有这样的诚意、信念和梦想，我几乎一无所有。如果这一决定今后这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组党目标能实现，就是让我在里面做个默默无闻的后勤义工我都心甘情愿。

### 一、建党四大首要原则：三个绝不、一个坚持

1. 绝不反对社会主义，但要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
2. 绝不颠覆国家政权，但要优化国家政权
3. 绝不分裂国家，还要收复失土
4. 只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但不接受其错误领导

#### 第一原则要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九个不是”“一个才是” “一个特别”

(1) 不让人说真话、经不起公开辩论的不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

(2) 政府官员的财产不能公开不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

(3) 政府官员的信仰经不起公开质疑与公开辩论的不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

(4) 无数类似周永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薄熙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郭伯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这三个代表们统治着且层出不穷地出现跟他们的意识形态相同、思维及行为模式高度类似的大小老虎硕鼠存在的国家，不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

(5) 官僚特权专制盛行不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

(6) 党营官营的国家资本主义不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

(7) 类中世纪政教合一本质特征的党政合一不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

（8）凌驾于法律之上、甚至肆意违反自己制订的的不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

（9）2952 全票通过的赤裸裸的虚伪虚假选举不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

（10）瑞典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才是人类世界最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或者说比中共官僚特权专制政权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因素的正宗社会主义。因为：瑞典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是货真价实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即便是社民党的主席，其享受的医疗福利待遇跟普通工人与农民也没有区别，不像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享受的医疗福利待遇跟普通工人与农民相差几百倍都不止；瑞典德国普通的工人农民，随时可以公开批评社民党的主席，而不用担心被删帖封号，更不用担心被抓进监狱。瑞典德国的社民党主席，任期一到就退下来，绝不会操纵修改党章宪法寻求连任。瑞典德国的社民党主席退下来后，就跟普通的民众一样，可以回老家种田养花，没有任何高于普通民众的特权。共产主义早已被证明是乌托邦，是绝不可能的；但瑞典德国模式的社民主义还是有可能的。

（11）所谓具有中国特色，不是特在别的什么，而是特在中共政权统治阶级里像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那样的三个代表们特别贪、特别腐、特别狠、特别诡诈还特别虚伪；特在中共党务系统宣传部门特别能洗脑，特别能颠倒是非，特别能混淆黑白，特别能歪曲真相；特在亿万中国民众特别好忽悠、特别好洗脑、特别好掌控、特别好收割韭菜。之所以美国的民主制度特别不适合中国，原因就在于此。中国只适合美国的麦当劳快餐，特斯拉轿车，苹果手机，好莱坞电影。美国只适合千百万中共政权的三个代表们转移妻子孩子和票子，只适合中国留学生留学，只适合无数知识财富技术精英们移民，只适合无数中产草根千方百计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走线去润。确实，美国的民主制度特别不适合中共官僚特权专制统治的中国。

## 第二原则要义：关于绝不颠覆国家政权

要优化国家政权，绝不颠覆国家政权。

中共政权从政治局常委、委员、军委副主席，到书记市长反贪局长，到处充斥着大小老虎和硕鼠。一粒老鼠屎弄坏一锅汤，那么，中共政权这口全宇宙最大的一锅共产主义的汤里，究竟有多少品种型号规格类型的硕鼠和多少粒硕鼠屎？铁的证据表明，中共政权的“操作系统”早已太过时，存在太多 BUG，是导致产生层出不穷的大小老虎和硕鼠的根本原因，因此，必须优化国家政权的“操作系统”，这就像软件系统不能一成不变，而必须进行优化一样。

优化国家政权，必须从优化制度开始，优化制度，必须从优化《宪法》开始，优化《宪法》，必须从去掉《宪法》中且违反宪法、宪政精神及法治原则的因素开始。

## 第三原则要义：关于绝不分裂国家

不仅不分裂，反而要团结，不仅不分裂，反而要收复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华民族的神圣领土。

（1）先以和平方式，采取“一国两制+美国购买阿拉斯加+日本购买华尔街”的融合模式收复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华民族的神圣领土海参崴、库页岛及外兴安岭。收复海参崴、库页岛及外兴安岭后，可以成立海参崴特别行政区、库页岛特别行政区及外兴安岭特别行政区，跟香港、澳门一样拥有高度的自治。

只有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华民族、至今仍被北极熊俄罗斯普京新法西斯政权占领的海参崴、库页岛及外兴安岭等 150 万平方公里的神圣领土（相当于 42 个台湾还多），重新回到中华民族的怀抱时，才能算得上中华民族真正伟大的复兴。

具有俄罗斯特色新时代普京（中共总书记最亲密的朋友）新法西斯政权野蛮侵略自由乌克兰，虽然是乌克兰人民的极大不幸，但

这个北极熊特务头子犯下的致命错误，无疑将把俄罗斯带向黑暗、贫穷、混乱的深渊，最终造成俄罗斯多次解体（这也有赖于一切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的有效战略与努力）。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这将是三百年来不断对外进行侵略与掠夺的北极熊俄罗斯罪有应得的报应，也是中华民族三百年才能遇到一次的一个伟大的历史机遇。

（2）先用和平方式收复海参崴、库页岛及外兴安岭后，再用和平的方式统一台湾。

不是说 2300 万台湾人想跟中国大陆统一就能跟中国大陆统一，而是要中国大陆公民举行全民公决，超过三分之二的中国大陆公民同意，才让台湾跟中国大陆统一。至于台湾是否愿意统一，那是 2300 万台湾人民的自由选择，他们也可以进行全面公决来做决定。

#### **第四原则：关于只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1）只接受能公开其个人及家庭的财产，财产的来源说得清、完全合法，且接受人民监督、批评或反对意见的共产党的领导。

（2）只接受其共产主义信仰经得起公开的答辩、辩论、质疑的共产党的领导。

（3）绝不接受财产无法公开，且其共产主义信仰经不起公开辩论的共产党的领导

（4）绝不接受类似周永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薄熙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郭伯雄（中央军委副主席）三个代表们的共产党的领导。

## **二、关于建党原则的基本结论**

根据以上前文对中国社会各阶层政治思想观念缩影的六个代表的分析，不难发现，绝大多数中国人（可能达到 90%）的政治光谱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倾向，而有自由民主

宪政观念的中国人（保守的基督徒天然具有这个特性）无疑只是极少数。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不得不说，这个情况确实跟中国的政治状况是高度匹配和一致的，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中国的自由民主道路如此艰难，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过去三十四年来一切海内外自由民主运动及公民抗争的仁人志士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那么大的牺牲，中国的政治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大幅后退的原因。

这看起来是十分令人沮丧的残酷现实。根据过去我在企业从事销售管理的经验，通常获取一个新客户的代价，平均是维持一个老客户的代价的 7~8 倍。人性是相通的，我觉得把一个本来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者转换为具有自由民主宪政观念者的代价，比寻找/吸引一个本来已经具有自由民主宪政观念者的代价至少不低于 7~8 倍。对于这个估计，但凡跟自己的民族主义或此倾向的亲朋戚友谈论过美国日本台湾话题的自由民主人士，一定会深有同感，有此经历的人会发现，跟他们的探讨或争论往往是徒劳无功的，甚至还会适得其反，他们还会觉得你被西方反华敌对势力给洗脑了。

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那怎么办？首先就是要认清现实，抛弃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然后就是转变认知和思维模式，改变战略方向，调整策略。既然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可以为中共用，为什么不能为我们（暂且叫中华进步党人）所用？之所以我早在 2008 年构思出中华进步党的基本思路，概括为上述建党四大首要原则“三个绝不坚持”，就是为了适用中国的国情，为了“草船借箭”把占中国人口绝大比例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转变成我们的势能，只是我没预料到的是，第三条原则包含的收复东北丧失国土的纲领，无意中正好命中了 2012 年现任中共总书记上台后搞出来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祖国统一”的两大宏伟目标。而我构思出来的纲领，正好重新定义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祖国统一”，正好形成了对他的“联独裁者普京、犯自由宝岛台湾”战略的降维打击。

正如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里明确宣告他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也不想对任何人隐瞒自己的上述观点，无论对 14 亿中国大陆民众，还是 9800 万中共党员，或者是成千上万海内外自由民主仁人志士。

这也是为什么 2008、2009 那两年我构思一个可能引领将来中国变革的新政党的名称时，完全没有往“自由”“民主”这类概念的方向上想，不是我不渴望自由和民主，而是我明白，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叫“自由党”，不仅得不到自由，连仅剩下的那一点点可怜的自由都会失去，如果叫“民主党”，不仅得不到民主，连做样子哪怕是虚伪的民主都将不存在（2592 全票通过是对赤裸裸的独裁专制的明证）。并且，也是我明白，通往自由民主最短的距离不是直线，而是中间隔着至今仍被俄罗斯占领的海参崴、库页岛及外兴安岭等 150 万平方公里的神圣领土。15 年后的今天，再回顾当时我的构思，我越来越意识到，我的构思不是过时了，而是越来越切实了。

### 以上三个版本行动思路、方向、方案的再次总结

第一个最低版本的方案，应该说是门槛最低、难度最小的，天经地义地符合最低限度的公理良知与常识，也无可争辩地符合哪怕是中共专制政权自己制订的法律法规，尤其是符合《宪法》。并且，是对压在千百万中国互联网从业者以及亿万互联网用户头上最邪恶的制度大山的反抗。千百万中国互联网从业者及亿万互联网用户对于这样邪恶的审查制度早就苦不堪言，但这个方案甚至并不要求从根本上否定中共的审查制度，而是其审查制度必须最低限度程序合法合规。

但这个方案，最终大概率会面临许志永博士维权案例的结果。第二个就更加如此，会面临比任志强先生严重得多的后果。这就回到了一个根本问题，回到了始终无法绕过的坎——无可避免、迟早

必须走的一步，组建政党进行抗争了。

## 组党最大的困难与挑战

纵观百余年中国历史，没有一个影响深远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能绕过组党这个坎。国民党、共产党自不待言，台湾的民进党就是鲜活的明证，韩国也不例外，即便甘地在印度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也要建国大党，因此，断不能因为中国民主党在国内昙花一现的组党被打压，就止步不前。相反，要像当年的中共那样百折不挠，不达奋斗目标不罢休。

在我看来，创建新政党最大的困难与挑战不是别的，不是来自中共政权的阻力，如果海外民主人士能达成历史性共识，铁了心要在海外组党，就算中共有 9800 万党员，就算中共有宇宙第二大经济体，又怎能拦得住？显然，创建新政党最大的困难与挑战不是别的，归根结底，还是思维、认知模式、胸怀和格局。

当然，道不同不相为谋。首先，在暴力和非暴力手段这个前提选项上，就筛选了一部份人。脾气性格志趣又筛选了一部份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是不是中共政权的七寸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再筛选了一部份人。把中国的非暴力变革伟大事业跟收复海参崴、库页岛及外兴安岭这一神圣使命联系起来，可能超出了离开中国现实生活许多年的人士的理解和想象，又筛选了一部份人，但只要不带偏见和成就，只要看看过去百余年的历史逻辑，就一点都不难发现中国的命运跟俄罗斯这个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只要在网络上稍微看看民意，就知道千百万人中国人早就有收复海参崴、库页岛及外兴安岭的强烈想法。这还没完，还有一些突发性的事件也会分化一部份人，仅举过去一个多月发生的国内外两件大事为例。

1.国外：10月7日哈马斯恐怖武装发动对以色列孕妇儿童老人（及音乐节部分参加者）的大屠杀。虽然以哈冲突、巴以冲突表面上看上去错综复杂，以色列作为民主国家其执政党的算盘，巴以两

个民族纪录在圣经里千年历史恩怨的延续，中东火药桶民族宗教情仇的纠缠，地缘政治博弈的交汇，再加上伊朗俄罗斯这些个外部邪恶批发商（相对于代理人）的渗透及卷入，似乎剪不断理还乱，然而，人的基本良知与常识，哪有那么神乎其神？哈马斯恐怖武装对以色列平民有明确目的大屠杀，就是一面镜子，照射出不同人的良知理智与情感的光谱。这件事既是一面镜子，也是一把筛子，又意外地筛出了一部份人，只能说，坏事变成了好事。

2.国内：前总理李克强的突然病逝。对于李克强，推特上明显分为两种对立的观点，同情理解的，以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女士为代表，以及恶斗狠批的，以赖建平先生为代表，中国之春网站上发布了一篇他写的《历史罪人李克强》，被多位强烈认同的海外民运人士转发。这里我无意对两种观点进行分析。我也认真看了《历史罪人李克强》，论文笔才华，绝对属上乘佳作。但显然，赖先生把中共邪恶不公的制度，跟这个制度之下每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给混淆了。并且，不可思议的是，赖先生还狠批李克强的夫人程虹女士“不是人”，因为程虹女士“自始至终没有掉一滴眼泪”。人可以有政治立场及观点的差异甚至截然对立，但作为人类，不去安慰不幸逝者的亲人也罢，还反过来在人家伤口上再狠狠捅几刀，再踩上几脚。难道不会给公众造成一种没有起码的同情心、同理心、人道精神的印象？

我个人觉得，哈马斯恐怖武装的支持者我们要远离他，但像赖先生类似的人士，我们还是要尽最大的善意、诚意、努力及大义来把常理常情和常识讲明，甚至感化他。要顾及国内民众对李克强总理及夫人的态度，不能只为显示自己反共立场的坚决而疏远中国民众的感情。

这就牵扯到另外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海外民运为何难以成功？1949年中共成功夺取政权有三大法宝，其中排第一的是理论联系实际，再好的想法也不能脱离中国社会的现实，第二就是密切联系群

众，也就是当年中共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以上就是我说的组党的最大困难与挑战并不来自看似强大的中共专制政权，而来自一切海内外自由民主与公民维权人士的自身。除了自身的认知、理解、思维这些方面，自身的价值观、理念、品格、性格、脾气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自身的视野、胸怀和格局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当然，我并不是说像赖先生以及跟他持类似立场观点的，就一定不是善良诚实正直的人，他们中可能不少是悲天悯人、见义勇为、为弱势群体慷慨解囊相助的爱心人士。人性是复杂的，理智、情感、意志、品格、性格可以产生无数排列组合，这个世界上，有的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例如胡叨盘、司马夹头、周带鱼，他们一点都不傻，只是良心已经坏透；有的人真的是又坏又蠢，例如老毛的最后一任老婆江青；但有的人只是认知偏差却心地善良。

所以，组建一个统一的政党，不是难在中共看似有多么强大，难就难在要把那么多不同背景和想法的人团结并凝聚在一起，既要有相同的价值观、理念与目标，还要有对实现这些理念与目标所采取的方式、途径、策略及手段有相同的认知和理解，并且品格、脾气、性格、行事方式还要合得来。然而，我的观点很明确：无论如何，都必须尽快组建一个统一的政党，绝不能等到上述价值观、理念与目标，还有实现目标所采取的方式、策略及手段全部都统一认识了，品格、脾气、性格、行事方式都全部合拍对味了，才开始组建政党，如果是那样，组建政党的时机和条件就永远不会有成熟的一天。相反，应该是一部份人先组建政党，先把旗帜竖起来，一部份人先行动起来，有了旗帜，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一起行动，一起前进，在抗争中磨练抗战，在战斗中学习战斗，在前进中识别并凝聚更多的志同道合者。这样，中国的非暴力变革才能开创新的局面，才会出现久违多年的历史性转折。

一百多年前，浙江嘉兴那艘小小的游船上创立中共的十三个代

表，来自五湖四海，大多素昧平生，彼此更无深入了解，但他们迈出组党的历史性那一步后，一切都开始不同了，从此中国的历史就被改写了。

现在，海外的仁人志士们，毫无疑问，无论品格素养、知识水平、认知能力，还是全球视野、胸怀格局、阅历见识，都只会比那十三个代表强得多，唯一的问题只在于：当千年未有之非暴力变革的钟声即将敲响，那些心系中国前途和命运，为此已经奋斗一两代人的自由民主先驱先辈先行者们，会迈出历史性的那一步吗？

#### **四、中国政治变革整体思路与方案的八条方针**

第一条方针：比“非暴力不合作”这个提法更能引起国内亿万民众的共鸣，更切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更命中要害的中心命题（口号，主张），是“中国千年未有之政治变革”。本文已经论述这一点。

第二条方针：“中国千年未有之政治变革”，首先必然是思想观念的变革，也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本文就是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的批判的武器。

第三条方针：“中国千年未有之政治变革”，必然是整体性、系统性的变革，这个变革必须要打到中共政权的“七寸”——中共政权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如前所述，细枝末节的零打碎敲早已走进了死胡同。本文就是为解决中共政权的“七寸”而形成的。

第四条方针：未来中国整体性的变革，必然要求成立一个全新的政治变革政党，以领导、统筹、推动、贯彻、实现中国政治变革的整体目标。本人已经把新政党的名称都想好了。只要动真格的，本人愿意当一个新政党的默默无闻的义工。

第五条方针：如果不能唤醒国内亿万民众的变革意识，激发国内亿万民众变革的强烈渴望，造成国内民众自愿、自发、自组织的

态势，最终形成国内政治变革运动的燎原之势，那么，今后中国的自由民主宪政化尝试，很可能会像过去三十年一样面临类似的结局。

如前所述，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及左派是当今中国社会绝对多数的现实情况下，能实现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四两拨千斤”的最佳策略是把他们转变为自由民主力量的势能，而不是试图去改变他们的观念（虽然他们中一小部份可能会转变）。本方案就是这样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案。

第六条方针：如果不能抓住中国社会除了 9800 万中共党员之外最决定性的一个群体，则中国的政治变革很难成功。这个群体就是为中国创造就业、纳税都超过 70% 贡献度的广大的民营经济群体。

第七条方针：堡垒从来都是从内部瓦解的，如果不能有分化中共政权统治集团，则未来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宪政很难成功。重中之重是分化中共政务系统跟党务系统，分化中共党内的社民主义者或有此倾向者，分化开明务实的改革派跟极端顽固腐朽反动派。

第八条方针：如果不把国际上一切有利的因素与形势利用起来，把国内因素跟国际因素进行结合、转化，做好几篇至关重要的大文章，则未来中国的政治变革很难突破。

稍微看看过去百余年的中国历史发展逻辑，中国之所以是今天的中国，跟俄罗斯有密不可分的直接联系。但天不绝中华，上帝还是为中国存留了最后一块自由的土地——宝岛台湾。从理论制度的根源讲，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跟犹太人马克思直接相关。由此不难看出，俄罗斯、台湾及基督教文明这三个支点/方面，是未来中国变革无法忽略的因素。

### 特别鸣谢

本文最初受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启发，后来又被 1517 年马丁·路德公开发布《九十五条论纲》的壮举所激励，中心主题及思

想早就存在我心里。但如果不是腾讯公司的微信公众平台一次又一次屏蔽我本来已经通过平台严苛的审核且成功发布的文章（甚至跟时政毫不相关），如果不是腾讯公司一次又一次侵犯我的言论自由，一次又一次践踏我的公民权利，我不一定有这么大的决心把我的想法如此全面而透彻地大声说出来。因此，我必须感谢腾讯公司。

另外，我必须承认，我多少也受了刀郎的启发。他用十分隐晦的方式表达他心中所想，这使我产生一个截然相反的想法：为什么不干脆就用直白、直截了当的方式，把我的想法公开表达出来？当然，刀郎作为非专业的草根音乐人出身，二十多年来坚持他的音乐梦，也鼓励了我这个坚持自由梦三十年而从未放弃的草根公民。现在，我即将完成肖申克式的救赎，即将获得全面的自由。所以，我也要感谢刀郎。

### 参考资料索引

- [1] 2023 年初中共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新晋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会议上的讲话。
- [2] 《一杯苦酒》，[俄]雅科夫，新华出版社，1999 年出版。序言是新华出版社写的，引述《李慎之回忆录》毛泽东在秘书胡乔木面前对斯大林的评价。至于 1958 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自称自己是“马克思+秦始皇”，则已广为人知。
- [3] 本人收藏的“中发[1974]1 号”红头文件，有这样一句“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见文末照片。

